

钱理群 著

生命的沉湖

「学苑话题」

生活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钱理群 著

生命的沉湖

—学苑话题—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的沉湖 / 钱理群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6. 8

(学苑话题)

ISBN 7-108-02463-2

I. 生... II. 钱...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7218 号

责任编辑 郑 勇

装帧设计 蔡立国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张 25.25

字 数 290 千字

印 数 00,001 - 10,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钱理群，1939年3月生于重庆，祖籍杭州。1960年毕业于人民大学新闻系，在贵州任中专语文教员18年。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为北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和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近年关注中学语文教育问题。2002年8月退休。

主要著述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心灵的探寻》、《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合著）、《周作人传》、《周作人论》、《丰富的痛苦——堂吉珂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1948：天地玄黄》、《学魂重铸》、《拒绝遗忘：钱理群文选》、《话说周氏兄弟》、《走进当代的鲁迅》等数十种。

学苑话题书系书目

- 01 陈平原 当年游侠人
——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
- 02 钱理群 生命的沉湖
- 03 夏晓虹 阅读梁启超
- 04 周振鹤 智者不语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刊行

责任编辑 郑 勇
装帧设计 蔡立国

目 录

第一辑 生命的沉湖

- 003 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笔谈
- 009 读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后
- 017 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回顾
- 030 现代汉语文学所走过的道路
- 036 略谈“典型现象”的理论与运用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的一个尝试
- 050 “找回失落的文学世界”
——答《南方文坛》记者问
- 062 文学本体与本性的召唤
——《诗化小说研究书系》序
- 069 令人大开眼界的文学史景观
——读《20世纪贵州文学史书系》
- 079 作为左翼作家的端木蕻良
——《端木蕻良小说评论集》序
- 086 用现代中国人自己的话真实地描写自己
——《20世纪中国小说大学生读本》序

095 研究思路的开拓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 年第 1 期编后记

098 面对新世纪的期待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 年第 1 期编后记

102 文学研究与当代生活的对话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 年第 1 期编后记

106 学术研究要言之有物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 年第 1 期编后记

109 理科文学教育的意义与困惑

——《北大理科学生作文选》序

114 追求工、理、文科的融合

——钱宁学术思想与教育思想概述

第二辑 精神散步

135 岁末谈读书（二章）

138 回到常识

140 经典的意义

143 北大校园里的“兔子”

145 谈谈先父天鹤先生的事

148 翠鸟远飞了

150 王瑶的意义

——《王瑶和他的世界》编后记

152 我与 20 世纪中国文化研究

- 154 沟通心灵的桥梁
 - 《彩色插图中国文学史》韩文本序
- 156 《散文选刊》卷首语
- 158 喜读《新青年文丛》
 - 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
- 165 评《文艺争鸣》的几篇文章
- 170 《文艺争鸣》百期诞辰赠言
- 171 当代四作家论
 - 一句话评语
- 172 要有自己的想法和发现
 - 评袁筱芬《何处是家园——诗学视域中的〈憩园〉》
- 177 自然科学与文化重建
- 181 文学与科学原本是一家
 - 《民族植物学论文集》序
- 184 为学生的网站写几句话
- 185 新世纪寄语青年
 - 应北京大学学生会之约而写
- 186 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彼此搀扶着
 - 在长江读书奖颁奖会上的讲话

第三辑 运交华盖

- 189 1999 年总结
- 196 2000 年伊始

208 我在做这些事

——2000 年总结

222 2001 年回顾

第四辑 炼狱之火

231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三一八”惨案七十三周年祭

244 我感到惊心动魄

——黄昌勇《王实味传》序

247 对共和国历史的另一种书写

——在《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座谈会上的发言

251 “燕山偶语遭奇祸”

——《燕山夜话》的命运及其影响

257 面对血写的文字

——初读林昭《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

262 二十九年前的—封书信

271 “咬紧泥层根不死”

——读韩乐群《刺梨蓬草》

278 失败者的不归路

——蔡玉镶《突围——一个底层知识者的人生体验》序

290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声音

——读文有感

294 另一种纪念

——《我们心目中的蔡元培》序

300 也算“立此存照”

——1999年4月10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演讲的开场白

305 致北大校长的一封信

308 我的某种不安

——致一位年轻朋友的信

316 “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

——王东成《生活与艺术人格》序

320 坚守我们的信仰，在今天的中国

——读袁沙《新诠详注〈文化偏至论〉》

325 我的忧虑、困惑和挣扎

——在上海大学“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变”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333 “真的知识阶级”：鲁迅的历史选择

——在韩国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345 心有灵犀——一束通信

第五辑 魂归何处

383 能写的与不能写的

——《拒绝遗忘：钱理群文选》序

390 本应归全家所有

——《钱理群文集》（四卷本）后记

392 后记

393 再记

394 三记

第一辑

生命的沉湖

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作为生活在当代中国的学者，我们的学术研究的问题，只能来自（或立足于）中国本土的现实；而对问题的学术性的解决，又必须是学理性的，有距离的，更带根本性的思考与研究：应努力在这二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笔谈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初版于1987年8月，修订本则于1998年7月出版，其间间隔了十多年，正经历中国文学研究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变迁，作为本书的作者之一，我自己的学术思想，包括文学史的观念与追求，都发生了某些变化，这种变化也会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对本书的修订上。但因为是集体写作，我们三人在合作过程中，又并未对文学史观念这样的全局性问题进行过深入的讨论，这本身也造成了本书内部的不尽统一与平衡这样一些根本性的弱点；但又因为我们是研究生的同学，在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上又自有一种默契，这就使得本书大体上保持着某种统一性。——当然，我下面所谈的一些问题，也主要是我自己的想法，并不代表其他两位作者，这也是要预先说明的。

本书初版本在写作与定稿过程中，我正热心于和另外两位同学——子平与平原合作提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全书完成后，由我负责统稿并执笔写“绪论”，也就很自然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观点写了进去。这样，《三十年》一书就因为我的关系，而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有了某种联系。今天回过头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我仍然认为它的基本精神是站得住的，并且已经事实上为学术界普遍接受，当然也还

有不同的意见，这也是正常的。但如果联系我自己当时的基本思想倾向与追求，文学观念与文学史观念，今天看来，当时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具体理解与分析，又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更多的恐怕是我个人的。我曾在一次与韩国学者的座谈会上，谈到我今天认识到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受到80年代乐观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时代氛围的影响，我对中国社会与文学的现代化的理解与前景预设是充满理想主义与乌托邦色彩的；我几乎不加怀疑地认定，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就是中国的现代化的理想模式；西方现代化模式与现代化本身必然产生的负面，则基本上没有进入我的观察与思考视野，对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出现的对“现代化后果”的思考与描述，都被简单地称之为“民粹主义”而加以否定。与此相联系的，就是受到“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撞击与回应”的模式印记是十分明显的。记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提出不久，在一片叫好声中，我的导师王瑶先生找我去，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他问我：你们讲20世纪为什么不讲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不讲（或少讲，或只从消极方面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俄国与俄国文学的影响？正是王瑶先生的及时提醒，使我开始反思，更使我懂得了应不断对自己提倡的东西进行质疑，这是直接影响了我以后的思考方式的。第三方面的问题，也许我自己是更为严重的，这就是历史进化论与历史决定论的文学史观的影响。新比旧好，新的总是胜过旧的；历史是沿着某种既定的观念、目标（我们称之为“本质”、“必然规律”）一路凯歌行进，即使有一时之曲折，也是阻挡不住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的，等等。

以上三个方面在80年代的思想、文化、学术界，以及具体到现当代（20世纪）文学史研究中，或许有一定的代表性，在90年代就自然受到了冲击。首先是现实生活的无情事实粉碎了80年代

关于现代化，关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种种神话。与此相联系的是“西方中心论”的破产。这都迫使我们回过头来，正视“现代化”的后果，并从根本上进行“前提的追问”：什么是现代性？如何看待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模式）？什么是我们（中国，东方国家）所需要（追求）的现代化道路（模式）？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这些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同时也是专业的追问：如何理解“现代文学”这一概念中的“现代”两个字？它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还是包含了某种性质的理解？那么，文学的现代性指的是什么？而这些问题都涉及到我们这门学科的性质、研究范围、它的内在矛盾等等关系到自身存在的根本问题。同时被追问的是，现代文学历史的起端：它究竟应按我们所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从上一世纪末（晚清）开始，还是从“五四”开始？——王瑶先生当年就不同意我们的“晚清起端论”，这一时期就有更多的朋友就这一点提出了质疑。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提出了这样的追问：该如何看待“五四”时期新、旧文学的斗争，由此开始的“新文化（新文学）叙事”，这种叙事肯定、凸显了什么，又否定、淹没了什么？在这种叙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观与文学史观？等等。除了这些前提的追问之外，有关“现代性”问题的广泛思考，还引发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诸如：（1）如何从中国文学、学术自身的发展，特别是晚清、民国（还有的朋友上溯到明代）以来文学、学术的发展，来揭示“五四”文学变革、现代文学的诞生的内在理路与线索；（2）如何将现代文学置于与现代国家、政党政治、现代出版（现代文学市场）、现代教育、现代学术……的广泛联系中，来理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3）如何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不仅是英美文学的影响，同时要关注英美之外的西方国家及俄国与东方国家文学的影响；（4）在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如何认识与处理“接受外来文化

的影响，实现中国文学（文化）的现代化的过程，同时又是反抗殖民主义的侵略与控制，争取民族独立与统一的过程”这二者的关系；（5）如何认识与处理本世纪文学发展的总格局中，新、旧文学，雅、俗文学及其关系，新文学内部的不同组成部分，自由主义文学、革命文学及其关系；（6）如何认识与处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及其在文学上的反映，由此形成的海派文学与京派文学的对峙与互渗；（7）如何评价反思现代化后果的文学作品及作家……所有这些反思都为现代文学的研究打开了思路，开拓了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困惑。人们似乎十分容易地就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例如反思“五四”，就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为“断裂传统”的罪恶的渊藪，并连及对“五四”启蒙主义、激进主义以及以后的革命文学的全盘否定，对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作家及其文学的理想化；强调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内在联系，就不敢肯定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与发展的巨大影响，在民族主义情绪膨胀的时候，连是否需要继续向西方学习似乎都成了问题；在重新评价旧体文学与通俗文学时，出现了对新文学（例如新诗）的全盘否定，在一些朋友看来，新文学不过是外来文学的移植，唯有通俗文学才是真正的“本土文学”。在注重于对现代文学与现代出版、教育、学术等外部关系的研究时，却又忽略了对文学形式、文学语言的变革，现代审美观念、趣味的建立……这样一些更加关乎文学现代性的内部关系的研究，等等。而在指出上述倾向时，又很容易地跳到（回到）另一个极端。

面对这一切，我感到了极大的困惑。如果说80年代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时，思想比较单纯，也充满了自信心，看准了某一点，就毫无顾忌地，旗帜鲜明地大加鼓吹；那么到了

90年代，思想就变得复杂了，脑子里充满了“问题”与“疑惑”。借用我的《丰富的痛苦》的说法，似乎是从堂吉诃德转向了哈姆雷特——尽管骨子的堂吉诃德气仍要时时显露。我发现，对大至国家、民族、社会的现代化道路，具体到自己专业范围的文学的现代性，我都只能说“不”——我拒绝、否定什么，例如我无法认同我们曾经有过的现代化模式及其相应的文学模式，我也不愿全盘照搬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及其相应的文学模式；但我却无法说出我到底“要”什么，我追求、肯定什么。径直说，我没有属于自己的哲学、历史观，也没有自己的文学观、文学史观。因此，我无法形成，至少是在短期内无法形成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属于我自己的、稳定的、具有解释力的总体把握与判断，我自己的价值理想就是一片混乱。我不过是在矛盾与困惑中，勉力写作而已。这并不只是因为年龄的增长，而实在是因为90年代中国与世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变化太大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太复杂了，而且我们对这一切太缺乏思想准备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在为自己80年代的单纯付出代价。

在我看来，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又经历了一次大绝望，其深刻程度并不亚于文化大革命那一次。绝望也是一种清醒：我终于明白像自己这样的知识分子、学者，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因为我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者之一，很多朋友都期待我能够写出一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这样的期待对我的压力是不难想见的；但我今天却要公开坦白承认：在可以见到的日子里，我大概是无完成这样的使命。但我并非无事可做：我所要做与能够做的，是在“文学现代化”这个大题目下的一个一个的具体课题的研究——单是我们在前文所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是要花大力气才能做出一些差强人意的回答的。这或许是一种“低调”的策略选择：只说自己